



明天文库·电视系列

电

视

系

列

从

书

重组话语： 新媒体时代的 中国电视批评

杨状振／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网融合”背景下网络电视台的建设、发展与影响研究(11CXW009)阶段成果
- “河北省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出版资助

重组话语： 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电视批评

杨状振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第一次从话语变革角度分析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现状,突出了大时代、大变革、大理论、大视野的特点,充满了新生代电视批评家的锐气和问题意识。全书以时间为经,以问题为纬,围绕电视批评语境、电视批评路径、电视批评理论、电视批评实践和电视批评机制等五个核心话题,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放置于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交织构成的权力谱系中,解析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尴尬。这其中既有对湖南卫视等地方电视媒体“错位、定位、越位”发展战略的思考与评价,也有对世纪之交前后“韩剧热”、“超女热”、“民生新闻热”、“广电集团热”、“新媒体热”、“限娱令”等热点现象的关注与分析。全书资料翔实,视角独特,逻辑清晰,分析准确,从中既可以获知中国电视理论研究 20 年来的发展变化,也可以探知社会和时代的变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组话语: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电视批评/杨状振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明天文库. 电视系列)

ISBN 978-7-313-08958-8

I. ①重… II. ①杨… III. ①电视评论—研究—中国
IV. ①J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6651 号

重组话语: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电视批评

杨状振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67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8958-8/J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序 一

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开始关注电视批评,2000 年出版了关于电视批评的著作《电视批评论》。2006 年底又作为首倡者和主持人,与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的其他几位会长、副会长,邀请了来自国家广电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央电视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的 80 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四川大学围绕电视批评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回首当时,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以此来带动国内外学术界对电视批评的关注,借论坛的召开来影响并改良中国电视传播中的某些不良现象和生态失衡。

如今六年时光匆匆过去,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这次努力,不得不说作为批评学者和建言人,我们的力量依然微弱。对于这一点,我在 2007 年应暨南大学之邀出席“首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时,就曾再次强调。记得在报告中,我把中国当下媒介批评力量之所以弱小的原因,归结为三大症结的叠加:一是批评渠道不畅,二是批评意见转化能力差,三是社会对媒介批评的认识存在缺位。这三点,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社会上看不到多少媒介批评改善的迹象。尽管如此但我十分欣喜的是我们的批评学者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许多年轻的学者不畏学术的辛苦,依然坚守耕耘在这一领域,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这其中就有我的学生本书的作者杨状振博士。

状振是我 2007 年开始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那一年,他们这一届同学中(当年学院有 296 名硕士研究生)有五个人通过川大研究生院组织的专家面试和研究潜质评估,幸运地成为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资格获得者。这意味着他们将提前一年结束

轻松的硕士研究生生活，进入到苦很多也累很多的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生活中来。四川大学给博士生定的科研任务很高，三年下来，他们大约要完成地方高校一个教授三年聘期的科研工作量。但压力对年轻人有时也是一种必要的动力，年轻人的肩膀上需要压上一副担子历练，路才会走得更加平稳和顺畅。有了担子才会有目标，有了目标才会保证他们的方向大抵不差。如今来看，他们当初这五位同学，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展得确实都还不错。

话说得远了点，但与本书并非全无关系，就像书中所集中讨论的电视批评一样，需要大家都来承担一份责任，都来进一言，它的未来才会变得更加美好。本书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书中的许多观点和看法，在平时的课堂讨论和师生聚会中，我们都已多有所涉及，譬如对电视批评的多渠道建构问题、对电视批评的虚假繁荣问题、对电视批评的开放性问题等。读过此书，相信大家会对我在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有更深入思考。需要稍作点说明的是，作者在书中所坚持的纯而又纯的批评状态，或许现实中我们永远也无法兑现，但其中所张扬的年轻批评者的诚恳姿态，却是我们作为一个团体，一直都在身体力行的目标。

状振是我的学生，但许多时候我常常把他当作学术朋友。他是一个对学术十分执著而有灵性的人，这表现在他近几年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上。2007年，状振刚入门攻读博士学位时，我就给他谈到准备进行中国电视批评发展的课题研究，并希望他担纲主要工作。在状振的带领下，一批年轻学者，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一部50多万字的著作《中国电视批评史》得以面世。著作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一课题研究，使状振对中国电视文化有了更深的读解，从而逐渐进入到一种良好的学术自觉状态，这为他以后的一系列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010年状振刚博士毕业不久，就以其扎实的研究基础和颇具前瞻性的研究选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当年和此后两年，我的学生中又有六七位同学先后中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这使我十分欣慰。多年来，状振凭着自己的执著和勤奋，与他的朋友、同学一道，在传媒学术领域书写着自己，尤其是在电视批评方面颇多建树。现在，我们虽然不常见面，却常常能够在全国各地寄来的学术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读到他的文章，字里行间依然能够感觉到他对学问的执著和他飞扬于其中的学术个性。

就如这本《重组话语：新媒体时代的中国电视批评》一样，名字似曾相识，文字却与其他著作全然不同。这是一种站在大社会、大文化视角上的另类叙述，充满了

年轻人的朝气和担当意识。全书说是电视批评,其实描摹的却是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全部。在状振看来,批评本身就包含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因此在他的笔下,“批评”也就成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代名词。对于这样的题目,我一向觉得,是需要作者具有相当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量的阅读储备才能够做好的,没有这个底子,作好这篇文章将会很难。从我目前读到的稿子来看,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毫无纰漏,但状振的努力及他在文中显示出来的对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熟稔,还是令我感到惊喜。

惊喜之一在于这本书重新建构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观察路径。批评语境、批评路径、批评理论、批评实践、批评机制和批评品格,这几章分类陈述并列在一起,实际上是从横切面上为我们把握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整体情势和整体面貌,提供了切片与样本,每一个切片和样本单独拿出来,又可组成另一部中国电视批评专门史。实际上,这种纵横交叉、点线结合的视角,是最为适合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观察和分析的,但以往我们过于注重了“点”和“面”,却忽视了对三者交叉视角下的纵深化、立体式探索。从这个角度上讲,状振的这本书,是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的。

其二,这本书还启用了“现象—系统—模式”的研究范式,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耽于冗长琐事叙述的弊端。全书以贝塔朗菲和帕森思的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将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分从生态学的功能依存关系(rélationship of 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和动态平衡关系(relationship of dynamic equilibrium)出发,剖析了困扰中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许多机制难题。这些分析或许未必全部正确,但其中彰显出的作者追溯中国电视研究全景的努力和对学问品格的坚守,却在喧嚣一片的现实场域中显得弥足珍贵。

此外,本书还贯穿了阿诺德·约·汤因比的“挑战—回应式”阐释方式,使论断做到了有的放矢和清晰简明。不过,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作者的行文有时跳跃性过大了一些,存在着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的痕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者在以后的再版修订中多做留意。

最后,我想借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一段话来收束这篇序文:“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我喜欢

批评能迸发出想像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

是的，电视批评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他们可能无法成为实践的裁判员，但他们却应该是点燃公众智慧火把的领航人。

是为序。

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欧阳宏生

2012年9月6日

序 二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这段时间,是中国广电行业发生产业化转向和批评理论变革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批评,不仅深深烙印下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痕迹,同时也体现出了社会转型反思调整时期,市场化、产业化、娱乐化社会浪潮与商品性、政治性、人文性和伦理道德等各种价值理念,综合作用交互错杂于电视批评领域的驳杂情形。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还是在“效率”经济的快车道上飞驰前进的话,那么 21 世纪以后的中国则逐渐进入了一个以强调社会“公平”和发展“均衡”为主要特征的转型调整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权力和文化调节三种力量间的博弈,越来越摆脱单纯的此消彼长模式,呈现出既相互扶持又彼此校正的“交互整合”式演进形貌。随着这一形势的形成与发展,社会文化内部精英主义的继续沦落与“折冲”坚守,消费主义的持续高涨与肆意泛滥,个人主义的合理爆发与极端成长,以及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与媒介融合浪潮,也都在电视批评领域投射下了自己的影子。

这一时期,许多为电视批评此前所没有关注,或关注度不够,或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的问题纷纷涌现,无论是集团化改革的起起落落,制播分离的进进停停,还是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新兴传播手段(如 IPTV、手机电视、视频播客等)的兴起,抑或是意识形态的潜隐、精英主义的去势、批评路径的分化、价值立场的裂变、理论衍生的叠加、产业观念的普及等,都将中国电视批评的实践进程及理论进化推向了一个大爆发的历史时期。可是,与此同时,伴随着热闹喧哗的前台景象,隐藏于电视批评规模化增长背后的诸多机制性难题,如电视批评理论的增生模式问题、批评品格的净化提升问题、批评机制的运行不畅问题、批评力软弱与现实生产转化能力差

的问题等,也都开始一一浮现出来,并日渐成为制约中国电视批评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视批评发展所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批评路径的分化与融合,这是反映中国电视批评发展进入繁荣阶段的标志,也是佐证中国电视批评群体理论取向发生裂变的表征之一。在考察中国电视批评历史实践和现实运作情况的基础上,本书将中国电视批评的路径划分为艺术批评、产业批评、文化批评三种。这三种路径不但反映了中国电视批评21世纪以来的取向分化现实,也构筑起了中国电视批评四通八达的实际运行体系,同时,还成为制造当下中国电视批评理论重叠交叉、复合衍生增生模式的重要肇因。相比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电视批评理论的外借性建构情形,21世纪初的中国电视批评理论除了继续引进西方理论体系外,也愈来愈重视本土的理论资源。在新的批评语境下,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将本土理论与西方理论体系对接,在取长补短中期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伴随着产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进位与升级,纯粹的电视艺术批评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再加上中国电视批评所涵盖对象的持续扩容与更替性增长,电视批评理论的边界也逐渐跨出传统电视批评的原有域畴,向更加广阔的电视生存空间及文化产业发展方向上转渡。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专注于电视本体理论研究的群体也逐渐浸淫于文化批评的思维模式下,并在不知不觉中将建构和发展批评理论的重心向文化领域倾斜。这一现象的泛滥,再加上批评群体“被放逐”与“自我放逐”的心态,使21世纪的中国电视批评不但没有减轻不自信的心理状态,反而在这方面有所发展和加强,表现在实践中则是更加缺乏独立精神。

从总体上来看,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视批评实践是在冲突与协商、对话与抵制的浪潮中展开的。电视行业产业化改革所带来的格局重构,再加上草根主义、平民话语与互动传播等新生活话语体系的形成与介入,使得原先隐藏于电视批评领域内的和平相处的各种意见与力量,表现出尖锐对立的态势。不同的批评主体在针对同一批评对象时,常常会得出结论迥异的认知结果,这其中又尤以一些能够代表中国电视节目时代特征,影响中国电视事业建设走向的热点话题,引起的社会反响与理论关注度为最大,譬如“超女”现象、韩剧现象、民生新闻和电视剧文化品格的世纪大讨论等。

另外,从批评机制与批评品格的走向上来看,原本就已存在于中国电视批评内

部的机制不畅问题与品格弱化问题也有所增强。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了电视批评主体队伍的自身建设,也造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国电视批评的实践进程中,批评精神涣散的现实。批评机制是统筹批评系统各元素间协调运作的制度架构,它既规范着批评主体的日常批评活动,也促进着不同批评主体、不同批评群落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对于任何一种批评活动来说,批评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都是推动和保证该批评活动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和制度保障。就整个 21 世纪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状况而言,批评机制的建设是落后于实践的,这其中历史积淀造成的原因,也有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和批评环境不够纯净、深受商业利益牵绊制约的因素。与以往相比,这一时期,商业性资本力量开始大踏步与行业利益相结合,并成为影响中国电视批评实践品格提升的关键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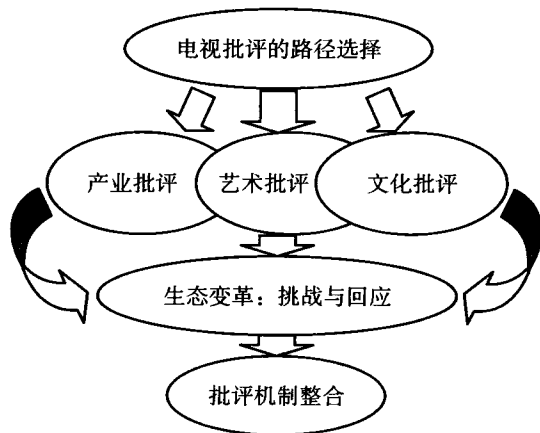
美国电视批评家约翰·费斯克曾以中世纪社会中的“吟游诗人(bard)”来比喻电视,认为电视作为当代社会文明进化的象征,正承担起中世纪吟游诗人的角色,将人们的生活作息与历史文化整理组织出一套又一套的故事或讯息,承担起下列社会聚合功能:“1. 明示文化成员对现实环境的共识。2. 鼓励暗示个别成员对文化中强势价值系统的支持。3. 歌颂传布个别成员在外地(其他世界)的丰功伟绩。4. 肯定该文化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适用性。5. 揭示文化自我意义与新环境之间的失谐之处。6. 说服众人相信其文化能保证个人身份及认同。7. 借以上种种管道传输文化成员的归属感。”^①另两位批评家霍瑞斯·纽康布和保罗·霍尔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念,认为电视作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论坛(TV as a culture forum)”,其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承担着协调社会成员歧议的使命和责任,正是因了电视的调停与润滑作用,才使不同意见的社会成员间得以寻找到维系和平共处的对话平台与沟通渠道。^② 这些论述固然佐证了电视媒体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及影响,但同时也反映了电视场作为社会成员意见汇聚中心的文化现实。惟其如此,针对电视媒体的批评活动也就更多了些挣脱不去的宿命色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批评者、每一个被批评者和每一个批评研究者,都无法须臾离开这个空间关系网络的制约,他们总在试图改变着这个世界,却又在被这个世界所改变

① J. Fiske & J. Hartley, *Reading Television*, 远流出版公司 1993 年版, p. 65.

② Horace Newcomb & Paul M. Hirsch, “Television as a Cultural Forum” in H.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03-515.

着。在进退攻守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一书中所说的“挑战—回应”式^①互动模式,循环往复、交替演进,却又无论如何也跳脱不开既定程式的牵引与规约。正是在这种不断遭遇挑战并不断与之相生共进的演化格局中,电视传媒与电视批评与电视批评研究者,一起推动了电视研究的进程,也形成了观照电视批评发展轨迹及其演进全貌的锁钥。

如果说以上还仅仅是就电视批评的外围层面,对电视批评中的种种现象,以及它们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宏观观照的话,那么由电视行业本身出发,对电视批评的研究模式进行建构,则是试图从中观层面上分析社会系统是如何作用于电视批评的理论努力。无论是电视媒体,还是其批评者,要想继续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取得与社会系统的默契与配合。这种默契与配合不是单方面的投怀送抱,而是各取所需的机智商谈,无论是通过樽俎折冲的谈判也好,还是通过兵戎相见的斗争也好,妥协与退让,适应与调整,都是批评各方达成共识,取得发展所不得不采取的应对手段。正面这个演进现实,就必须承认中国电视批评在价值取向上以及批评路径上发生多元化演变的现实,而这个现实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分立与对抗。也正是在这重意义上,图序-1所绘的电视批评的路径分化,才有了



图序-1

① [英]阿·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87页。

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参考意义。^①所有的对电视批评现象的梳理与评点,都必须纳入到中国电视批评—中国电视实践—中国电视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观照链条中,从社会运作的整体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和评点,方能够做到准确的理解与阐释。同时,也只有将众多的批评现象统合在批评理论、批评路径、批评机制、批评品格的分析模式下,我们才能够对驳杂纷乱的21世纪电视批评全貌获得一个相对清晰的整体印象。

从整体上讲,21世纪的中国电视批评仍然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基本分布格局,形成了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行业批评、以学术研究力量为主导的学院批评和以社会公众与网络媒体为主导的社会批评三方鼎立的局面。同时,这三者在各自谋求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下了深深的信任危机与心理芥蒂。在他们中间,基于不同利益诉求而造成的批评权力的让渡与争夺,基于不同批评路径而造成的批评机制的沟通与滞碍,也与实践本身一起成为了中国电视批评发展中亟需调整 and 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经过了蹒跚学步时的艰难求索,21世纪的中国电视批评应当建立起拥有生命精神的批评系统,它蕴含着批评者的情感与智慧,也饱含着批评者的汗水与体温。无论在当下还是在未来,恪守批评中的独立意识与商谈伦理,都应该成为中国电视批评走向更加成熟和更加稳健所必须持守的品格与精神。

杨状振

2012年9月5日

^① 参考作者在《中国电视批评史》中的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批评语境：“去势”与“加势”	7
第一节 政治权力作为社会调停角色的位置转换	8
一、意识形态的潜隐智慧	8
二、在“效率”与“公平”之间	12
第二节 文化精英主义与市场消费理论间裂痕的深化	16
一、精英主义的“去势”与坚守	17
二、批评者的价值重构与折冲智慧	21
三、文化产业化中的逻辑谬误与观念冲突	25
第三节 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媒介生态演变及语境反思	30
一、“新媒体”与媒介融合	31
二、“地球村”时代的不对称传播	38
第二章 批评路径：分化与融合	44
第一节 广电管理体制的产业化变革	45
一、中国电视产业化变革的发展历程	45
二、电视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几个节点问题	54
第二节 批评取向的分化演进	65
一、产业批评的兴起与发展	66

二、艺术批评的精细化演进	72
三、文化批评的拓展与延伸	76
第三节 文化批评主导下的路径融合	81
一、产业变革引发的电视批评价值变迁	82
二、以文化批评作为平台的路径融合	85
第三章 批评理论:建构与解构	88
第一节 批评理论来源的多源性与共生性	89
一、批评理论来源的中西杂糅与古今兼容	89
二、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批评思维方式	94
第二节 批评理论的复合式增生	99
一、批评视野的扩展及交叉延伸	100
二、批评手段的多面向多层次整合	104
三、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组合及其繁衍增生	110
第三节 “批评”之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探索	116
一、电视批评本身成为研究对象	116
二、电视批评作为学科建构的中西对比	122
第四节 批评理论繁荣增生下的话语危机	130
一、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增生方式	130
二、被“放逐”与自我放逐的批评心态	136
第四章 批评实践:冲突与协商	141
第一节 21 世纪电视批评中的热点问题	142
一、关于电视剧文化品格的世纪辩论	142
二、“超女”现象与电视娱乐化浪潮的争议	148
三、韩剧热播引发的社会文化反思	153
四、电视民生新闻的前前后后与是是非非	157
五、电视广告的文化传播学批评	165
六、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商业之讥	172
第二节 批评实践中的问题与反思	177

一、批评问题及批评视角的选择	178
二、批评中的“缺席”与“在场”	181
第三节 “限娱令”的指向与影响	185
一、“限娱令”政策解读	186
二、“限娱令”的政策指向	187
三、“限娱令”带来的卫视格局之变	188
四、“限娱令”促进的电视节目评价机制之变	191
第五章 批评机制:沟通与阻滞	194
第一节 电视批评主体的群体分类及代际转换	195
一、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行业批评	195
二、谋求话语独立和体系自足的学院批评	199
三、行走在有序、无序之间的社会批评	203
四、批评主体的代际转换及其影响	208
第二节 电视批评机制的建构模式及可能通道	211
一、以美国电视批评运行机制为参照系	211
二、提升行业协会作为批评联通机制的作用	218
三、建设以行业管理部门为依托的批评生产力转化平台	221
四、重视公民团体和媒介素养教育在电视批评中的地位与作用	224
结语	228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42

导 论

为了把本书的主题、性质和范围进一步界定清楚,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所提的“电视批评”一词的具体含义,这不仅涉及文内的许多表述,也涉及本书的研究视点与研究思路。对于电视批评一词,已经为研究者所共同认定的看法是将其与“电视的批评”一词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是同文学批评、文艺批评等用语一样的学术名词,属于宾语前置性表述,其实质语义为“批评电视”;而后者则为偏正性结构的名词短语,其语义为“由电视媒介实施的批评报道”,是指电视报道中的一种常见类型,即俗称的“曝光”(代表节目如《焦点访谈》等)。^①在本书中,电视批评一词所指代的对象,同样将严格限定在第一种用法的范围内,即指与文学批评和文艺批评等并列的学术概念,而非指电视媒体在新闻报道或日常采访工作中经常使用的批评性报道这一语义。

对于电视批评在学术研究语境中的具体所指,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一是周安华在《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的界定,“所谓影视批评,是以影视作品欣赏为基础,以影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影视现象(包括影视作家、影视剧创作、影视欣赏以及影视理论批评等)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创造性艺术文化活动”^②;二是欧阳宏生在《电视批评学》中的界定,“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背景,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③;三是时统宇在《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的界定,“电视批评是以电视传播内容为基础的一种价

① 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② 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

③ 欧阳宏生等:《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值判断和理性审视,是对影响电视运作全过程的诸要素的全面评析”^①。在以上三种界定中,由于周安华将影视并提,因而不可避免地将电影批评和电视批评等同看待,取其共性而相对忽略了电视批评在更宽广层面上的含义,“因此,对影视批评所下的这个定义可能是确切的,但对电视批评而言,应该有更宽广的视野”^②。在这方面,欧阳宏生的界定和时统宇的界定显然更为合理,他们吸收了媒介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并以其为参照系对周安华的前述界定形成了扩展与补充。

在《电视批评学》和《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欧阳宏生和时统宇为了更加合理地描述出电视批评的语义及其涵盖范围,都引用和参考了学界有关媒介批评的概念界定。他们所引用的这些表述包括:一、王君超的《媒介批评》,“媒介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它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判的过程”^③;二、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媒介批评是指在解读新闻及其媒体的过程中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由此衍生出的媒体批评学则指“通过解读经验理论化的途径,揭示隐蔽的解读规律,建立评价媒介的概念体系和范畴”^④。《电视批评学》和《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有关电视批评研究的最具权威性的两本代表性著作,而作者在其中所表现出的对电视批评概念界定的不一致性,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电视批评研究中概念界定本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两本著作所引用的有关媒介批评的概念界定,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早,全部来自2001年的国内出版物。随着媒介批评研究的发展,其中的一些概念与提法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在新的研究语境下,一些概念的提出者也在不断修订着自己当初的观念与看法——如刘建明就在其2008年发表的《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一文中,将媒介批评的研究范围进一步细化,明确为“三个视域”:(一)批评媒介,集中于媒介的社会价值分析,揭示媒介的制度性结构及功能”;(二)分析传播内容的质量……告诉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真相”;(三)评价传播内容的社会效果,就是社会效果批评”。这一修订实际上是将作品、媒介活动(制度结构与运作)和社会作为媒介批评的三个维度与目标,刘建明认为非此则难以建立批评的制高点。^⑤除此之外,对于媒介批评的概念界定与表述,较

① 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欧阳宏生等:《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③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④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⑤ 刘建明:《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12期。